成语、惯用语界定标准之我见

——由“表意双层性”引发的思考

刘　静　静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成语、惯用语是人们惯常认定的两类重要熟语。学界为上述两类熟语所下的定义及其界定标准不很一致,准此而析出的一些单位常常得不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文章从理据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三方面,考察分析了曾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表意双层性”理论,判断其得失,并据原型范畴理论及隐喻理论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弹性的语言观和柔性的处理法则或于问题的解决更有裨益;将二者截然划分开来的绝对标准——对外有排他性,对内有普适性的标准——或许本来就是理想化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中。

[关键词]　成语;　惯用语;　划分标准;　表意双层性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6)01 - 0101 - 05

一

汉语熟语的研究,数十年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实绩。然而对于熟语成员中成语和惯用语的性质及其界定标准究系为何的问题,学界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不乏霄壤之见。理论问题不能厘清,实践工作自受影响,目前所见的成语、惯用语、谚语等词典条目常有的交叉和重复现象,即是与熟语各类别的性质及其划分标准的尚不完全统一有关。有鉴于此,几十年来,学者们为合理而有效地划分开各类熟语单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较有影响力的理论,刘叔新先生的“表意双层性”理论即是在成语和惯用语的划界问题上的一项探索。

“表意双层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成语和惯用语可凭借有无表意双层性界定开来,成语有表意的双层性,即除了字面上的表层意义之外,它们又蕴含着另一层隐而不露的深层意义;惯用语没有表意的双层性,字面意义就是其本身所要表达的确切意义。该理论的雏形是刘先生与李行健先生于 1975 年合作的《怎样使用词语》一书中提出的成语具“意义的双层性”特点的观点,后在 1982 年,刘先生《固定语及其类别》一文对该观点作了进一步分析和阐述,认为:“成语的重要特征,凭之基本上能同所有其它固定语区别开来的特征,是表意的双层性:字面的意义具有形象比喻作用或使人联想的作用,透过它曲折地表现仿佛处于内层的真实意义。”“表意的双层性,使成语在意义内容上别具特色,依据这一特点,什么是成语,什么不算,是易于断明的。固定语中,凡表意具有双层性的单位,无论只用于口语或书面语,也无论具有悠久的历史或只产生于现代,都是成语。”[1]64 1990 年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以下简称《描写》)中先生除表明“意义的双层性是汉语成语的区别性特征”外,亦表示了不同意“形式上‘四字格’的就是成语”的观点,认为“纯从音节(字)的多少来确定固定语的不同类别,是不成的,至少也毫无意义。”[2]138 至 2002 年《关于成语惯用语问题的答问录》一文中,刘先生肯定地说明“‘有无表意双层性’是划分开成语和惯用语的唯一正确、合理的依据”,“所有其他提出来的划分标准(即依据),或者不能像它那样反映实质的区别,或者不像它那样可据以毫不含糊地把成语、惯用语彻底划分。总之,没有它的适切性,不能合理地或清楚、彻底地划分开成语和惯用语”[3],“表意双层性”理论被完整而自信地公之于学界。

“表意双层性”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界对成语、惯用语问题的广泛讨论,几十年间学界既有积极支持响应者,亦有质疑声,前者如王吉辉、谭达人、张旭、黄玲玲等先生,后者如吕冀平、李行健、周荐、温端政、张绍骐、张志毅等先生的观点。在对表意双层性提出质疑的学者中,有的不同意用表意的“双层

[收稿日期]　2015 - 10 - 22
[作者简介]　刘静静(1987-),女,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性”作为唯一的标准,有的认为该标准不是最主要的区别性特征,也有的认为该理论的前提,即所谓的“双层性”本就是不存在的。这表明,“表意双层性”理论虽自提出至今已有年数,却并未因时间趋久而取得学界共识。这促使我们对该问题做番思考。

二

“表意的双层性”究竟是否存在?成语是否真的具有表意的双层性?是否只有具有“表意双层性”的单位才能被视为成语?又是否他类单位就不具有所谓的“表意的双层性”?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在谈“表意双层性”理论这一划分标准的合理性之前,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我们看到,成语有意义的双层性这类观点,并非始于刘叔新先生①。只是,学界对于成语是否有“表意的双层性”问题的看法历来不一,如武占坤先生1962 年即已指出成语可分“组合性成语”和“非组合性成语”两类,前者指的是“意义跟字面意义的逻辑组合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人们可以根据它字面意义来理解和运用”,后者指的是“实际意义和字面意义的差异较大的”一类[4]。这样不同观点的争论,肇于当初,以迄今日,似乎从未间断。而要合理回答以上问题,则应首先明晓真正的“双层性”是否存在。

我们认为,倘字面上文字堆砌的“意义”不被使用,即不存在,就不能称之为意义具有两层性。如“胸有成竹”、“三心二意”,很难想象一人之身会有三颗“心”,也难想象一个人的“胸”中会生长有“竹子”,它们不过是通过比喻、烘托、风趣等一系列手段而达到形象表义的效果,其字面意义是不存在的,也无人会作以那样的理解,除非望文生义。因此,正如刘先生自己所言,“隐含着的才是真实的意义”,成语的意义也就只有一层,即通过比喻手段产生的这一层意义,我们暂且称之为“喻借性意义”。

明了上一点,再来分析刘先生所划定的成语范围。刘先生认为,凡具喻借性意义的单位即是成语,其它不能称之为成语。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恐不然。因为喻借性意义特征固然可以作为成语的一个特点,但它只是成语成员中的某类所具有的特征,另一些不具喻借性的四字格单位,如“艰苦朴素”、“安分守己”等常用来表示对人的工作生活的具体鉴定的条目,它们很难不被视为成语,但它们却不符合刘先生所认定的成语资格。

如此已明确,实际语言使用中,不存在真正的“表意的双层性”,那些为刘先生视为成语的单位,它们也只具表意的一层性——即喻借性的意义而已。倘一定要将这“喻借性”说成是“表意的双层性”,也只能是被称作“假性的双层性”。而即使这“假性的双层性”特点也并非为成语所独有。胡晓研先生曾表示:“熟语的这种表意双层性并不只是在成语中有所表现,而是表现在整个汉语熟语系统中。”“汉语熟语表意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即具有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5]论述颇中肯綮。实际上,据周荐[6]、余桂林[7]二位先生研究,惯用语和成语有喻借义的分别占90%和38.82%,成语无“喻借义”的却占到了61.18%。这不仅说明喻借性的特点并非为成语所独具,而且引发疑问:为何刘先生只拿“表意双层性”来做成语、惯用语的划分标准?为何不可以拿它作为另外的词汇单位的划分标准(比如歇后语和谚语)?

需要说明的是,刘叔新先生曾指出,“表意的双层性并非唯独成语才具有,它也出现在很多的谚语上和一部分复合词上。”[1]76如,作者认为属于言语的常语范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和公认是词的“龙眼”、“佛手”等单位,也都具有“意义的双层性”。只是,既说有无“表意双层性”是划分开成语和惯用语的标准,又说部分谚语和复合词也有“表意的双层性”,那么先生所谓的成语、惯用语和那“部分谚语”、“部分复合词”如何区别?此部分谚语和彼部分谚语,此部分复合词同彼部分复合词,又该如何分类?当然,刘先生对此是做过部分说明的,他说“成语和谚语由各自属于语言和言语的范畴而足以划分开来;共同有着表意的双层性,并不影响到区别它们两者。”[1]76然而,成语和谚语如何划分开来,依靠言语和语言的区分是否合适?一方面说“固定语中,凡表意具有双层性的单位,无论只用于口语或书面语,也无论具有悠久的历史或只产生于现代,都是成语”,另一方面又说部分谚语和复合词也有“表意双层性”,这是否有些交叉或自相矛盾呢②?

诸如上述问题另可举其一端,如具有“假性双层意义”的二字格单位,它们是词是语?刘先生认为:“理论上说,成语或惯用语可由两个单音词构成,因此会存在二字格形式的。成语、惯用语的实质不由多少个字的格式来决定;它们除了以两个音节为下限、十余个音节为上限之外,不可能有具体音节数形式的条件。从普通话的实际情况来说,二字格的成语、惯用语是极少的,但是不能说没有。”[3]同文,刘先生认为粤方言中的“煲水”、“撞板”之类是成语,“搵笨”、“偷佬”之类是惯用语,至于“大饼”,

则是词,普通话的“吹牛”、“装蒜”也属于词。我们对粤方言知之不深,不过也存些疑问:按照先生的理论,倘“煲水”、“撞板”之类是成语,“风声”、“油滑”、“炮灰”、“雪里红”③之类为何不是?“揾笨”、“偷佬”之类归为惯用语,是否与“煲水”、“撞板”归为成语相矛盾?普通话的“吹牛”、“装蒜”按照先生的“表意双层性”理论,不是应该归为成语吗?为何先生将其视作了“词”?原因或在于倘将“吹牛”等单位视为“成语”,则成语的范围将从另一角度变得宽泛甚至模糊?且大量的二字格单位(远非刘先生所认为的“极少”量)会因其意义不能从字面理解或将面临无所归从的命运④?

该种归类是否为先生的一时之忽,不得而知。但据先生的理论划分出来的成语和惯用语与学界的惯常所指⑤常相违背也可谓事实。虽然先生已表明不同意按照有无表意双层性来区分成语、惯用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固定语不同类别——包括成语、惯用语——的划分放在一次性的、一个层次的分类上,甚至是把熟语各种类别的区分放到同一划分层次上,从而忽略了我按照有无表义双层性作的划分只处在熟语分类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或层次这一要点,抹掉了应用我这种划分的依据必须具有的范围条件。”[3]62但是其排他分类法,以及分类步骤、原则和结果是否合理,仍需验证。或许正因为此,其他一些学者才如是说:“‘双层性’的提出,恐怕是出于直觉。”[8]

三

“表意双层性”理论能否堪称划分成语、惯用语唯一正确、合理的依据?其可行性、可操作性如何?

对于“表意双层性”理论,王吉辉先生认为:“意义双层性标准的确立,为根本区分成语与惯用语提出了理论依据。鉴别某一固定语是否为成语,实质上只须看这一固定语是否包含了双层的意义。”[9]刘叔新先生自己也曾表明:“‘有无表意双层性’是划分开成语和惯用语的唯一正确、合理的依据。”[3]两位先生的话很干脆,事实是否如此?

首先,从划分标准看。王吉辉曾分析了以往划分成语和惯用语的系列标准,在指出这些“用以区分开这两者的一系列标准能否切实有效地将它们划分清楚,颇可怀疑。因为每条标准都可以既适用于成语也同样适用于惯用语,所存在的至多只是程度方面的差别”后,进而指出:“结合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而提出的意义双层性标准既新颖又令人信服。而且,根据这一个标准,不仅在分类时可做到没有遗漏,更重要的是能把成语、惯用语与意义的有无双层性相互整齐地对应起来,简洁而又明了,更加便于掌握。”[10]王文所言“标准新颖”,极是,但是否兼顾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是否做到了“没有遗漏”?似不好在未充分论证前如此遽断。从刘先生的论述可见,他划分成语和惯用语的依据还是以意义为主的。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意义标准实在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常常使语言学者在给语分类时陷入‘斩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11],因为“从意义出发进行科学划分,必然更多的依赖人的主观感觉,而主观有时会因人因事而异”[12]。何况在是否存在“表意双层性”上,学者们本身亦有不同的观察和看法。以成语“举目无亲”和“举棋不定”为例,温端政先生据《汉语成语辞海》⑦的释义,认为二者不论是语法结构还是语义结构都很相似,“很难辨别一个没有双重意义,一个具有双层意义”[13]57。而主张以是否具有双层意义区别惯用语和成语的学者则认为“举棋不定”是成语,“举目无亲”因其不具有双层意义而被视为惯用语,理由是“‘抬头看不见一个亲人’与‘形容人地生疏’之间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后者对前者作了更进一步的概括而已。”[9]由此便看出分歧。“以意义作标准对语言单位进行分类时必须以一定的形式为依托 ,在考虑意义标准时须得考虑形式标准。这大概可以说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通则, 任何一类语言单位的研究概莫能外。”[14]有鉴于此,适当规定一下成语和惯用语在形式上的特点,或许能避免成语“除了以两个音节为下限、十余个音节为上限之外,不可能有具体音节数形式的条件”[3]的宽泛,以及由此带来的交叉和模糊现象。

退一步说,假设我们暂把“表意双层性”作为成语、惯用语的划分标准,但若将其“当成唯一标准,而不考虑汉语的特色和人们的语言心理,恐怕难以行通”[15],因为根据意义双层性标准得出的“成语”“惯用语”类别与“人们的语感有很大的落差”,“这样划分出来的结果,不大容易为大家所接受”[13]58-59。当然,“语感”在划归熟语单位时的标准作用究竟应该占到多大,或还可以讨论,但是有些学者主张“在鉴别成语与非成语时应介入一条语感标准。凡符合多数人的成语语感的短语就是成语”[16]却不无道理,这点从刘叔新先生自己亦曾运用语感来评介他人理论时可看出。如刘先生在评介一些学者所持的“成语应出自古代的作品或故事传说,应有悠久的历史”的观点时就曾说:“根据这个特点所确定的成语,未免范围狭小,……,有些完全符合这个特点要求的固定语,却不符合人们关于成语的观

念”、“像‘声色俱厉’、‘风和日丽’、‘前功尽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等要看做成语,也显然怪诞,不符合人们的语感。”[2]137 即表明了先生自己对语感鉴别作用的运用。此外,在谈到其自身的“表意双层性”理论时,刘先生亦说:“是否具有这表意的双层性,可以把成语同固定语中其他的单位有效地区别开来,区分的结果,是成语或不是成语都大体符合人们的语感。”[2]139

事实上,依据“表意双层性”这一特点,什么是成语,什么不算,不是那么易于明断的。虽然主张“表意双层性”标准的学者能够勉强给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但问题本身并不简单和明朗。如“漏洞百出”、“民怨沸腾”、“名列前茅”等单位就因其有“双层意义”的那部分(‘漏洞’、‘沸腾’、‘前茅’、‘燃眉’、‘九泉’)为主语、谓语、宾语等句法结构的主干成分,而被有些学者判定为成语;“燃眉之急”和“含笑九泉”等单位,则由于有“双层意义”的部分处于修饰语和补语地位,而难以被认为整个单位具有“双层意义”,因此都被归入惯用语[9]。如此归类本身是否科学,可另当别论,仅就这样复杂的判定标准,恐怕即使是资深的语言学者也不会否认其难以掌握,需大费力气,遑论一般的读者大众呢?

四

成语、惯用语的所指及区别究竟为何?是否必然存在将二者截然划分开的绝对标准?

原型范畴理论及隐喻理论告诉我们,成语和惯用语都有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之分,亦有新与旧、常用与非常用、通用与非通用等的差别。过去的几十年间,学者们对成语和惯用语的性质、范围问题做出了广泛的探讨,即使未能取得一致,但为多数人认可的意见还是基本能确定二者中的典型成员的。

在我们看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典型的惯用语简单定义为“语言中习用的一种固定词组,主要来自口语,结构比较灵活,其意义多为语素字面义的比喻或引申”[17];典型的成语定义为“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18]应是能取得学界基本认同的。

至于是否必然存在将二者截然划分开的绝对标准,人们自然希望找到一个最理想的标准——对外有排他性,对内有普适性,并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使我们得到一个界限明晰的概念的范畴。但是“范畴化是一个复杂的、模糊的认知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明确的……我们无法在成语、惯用语和其他相邻子范畴之间划出一道森严的楚河汉界,只能通过对其原型的精确描述,概括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成语、惯用语家族由原型到边缘成员之间逐渐过渡的连续统。”[19]何况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任何单位也都存在与他单位的同异两性,共性和个性,乃是一体两面的。也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在对成语和惯用语的判定问题上,往往采取或折中或具体分析的办法,如赵鹏的主干筛选法[20],刘中富的分项赋值法[21]等等。这或许提醒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思路也许应做一番思考和调整,相较于绝对的单一标准,弹性的语言观和柔性的处理法则,或许对问题的解决更有裨益。

注释:

① 何蔼人先生早曾表示:“成语一般是用来比拟或讽喻,言在此而意在彼。”

② 该类“矛盾感”在先生其他论述中也曾出现。比如先生在论述其不同意按照形式上的区别来区分谚语和固定语时,就将“骄兵必败”、“疾风知劲草”等短到四五个音节的单位径视为“谚语”(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1:),这不仅与先生倡导的“表意双层性”理论内旨相违背,也恐怕不能得到学界的认同。

③ 刘先生在《固定语研究及其类别》一文中,是将这些单位视为词的。

④ 因为从现有学者的研究状况看,“扯皮”、“搭桥”、“放羊”等单位有人将其归入成语,有人将其归入惯用语,有人将其归入词。

⑤ 刘先生划定的成语未能把不少不存在争议的成语包括进来(如“艰苦朴素”、“安分守己”等),且将大量的为学界认为是惯用语的单位(如“穿小鞋”、“碰钉子”等)囊括了进来。

⑦ 朱祖延先生主编。该词典释义:【举目无亲】抬眼一看,见不到一个亲人。形容人地生疏,孤独无靠。【举棋不定】举起棋子不知这一着如何走。比喻临事犹豫不决。

[参考文献]

[1] 刘叔新.固定语及其类别[M]//语言研究论丛第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刘叔新.关于成语惯用语问题的答问录[J].南开语言学刊,2002(1):62-70.

[4] 武占坤.有关“成语”的几个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1962(2):99-118.

[5] 胡晓研.汉语熟语表意双层性问题说略[J].东北师大

学报,2013(1):89-92.
[6] 周 荐. 词汇学词典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9.
[7] 余桂林. 四字成语的结构、功能、语义及释义特征[M]//李如龙,苏春新.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4.
[8] 张绍骐,张志毅. 简单枚举和定量分析—成语和惯用语典型群的建立[M]//温端政,吴建生. 汉语语汇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78.
[9] 王吉辉. 意义的双层性及其在成语、惯用语划分中的具体运用[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71-75.
[10] 王吉辉. 成语的范围界定及其意义的双层性[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68-72.
[11] 李小平. "语汇学"及相关问题[J]. 汉语学报,2008(4):41-46.
[12] 李行杰. 语词分立势在必行[M]//温端政,吴建生. 汉语语汇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3-41.
[13] 温端政. 汉语语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 周 荐. 惯用语新论[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128-139.
[15] 吕冀平,戴昭銘,等. 惯用语的划界和释义问题[J]. 中国语文,1981(6).
[16] 姚鹏慈. 关于成语语感与成语度的思考[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2):37-41.
[17] 徐祖友. 惯用语的性质和惯用语词典的收词[M]//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中国辞书论集.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19-127.
[18]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6.
[19] 刘丽梅. 对惯用语的重新认知[J]. 邯郸学院学报,2011(1):99-104.
[20] 赵 鹏. 谈主干筛选法在划分成语和惯用语中的运用[J]. 励耘学刊,2005(2):186-191.
[21] 刘中富. 成语的界定与成语的层次性[C]. 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会议论文,2013.

The Opinions to the Problems of Ready Phrases and Habitual Phrases

——A reflect on the Bi-leve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 idioms

LIU Jing-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Ready phrases and habitual phrases are two accustomed idioms that still have no coincident definitions in academic and the units analyzed from which can hardly be acknowledged by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theory of Bi-leve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 Idioms from three parts, motivation, rationality as well as maneuverability, judging its gain and loss and proposing new opinion based on prototype theory and metaphor theory: Flexible language view and elastic method of disposition are more beneficial to solve the problem while the absolute dividing standards, which are exclusive externally and universal internally, are too ideal to exist.

Key words: ready phrases; habitual phrases; definition; bi-leve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 idioms